

甘肃近代社会史

邓慧君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甘肃近代社会史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资助出版项目

邓慧君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肃近代社会史/邓慧君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226-03551-1

I. 甘... II. 邓... III. 社会发展史—甘肃省—近代
IV. K29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3520 号

责任编辑：马海亮

封面设计：王林强

甘肃近代社会史

邓慧君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西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223 千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册

ISBN 978-7-226-03551-1 定价：22.00 元

前　　言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甘肃近代社会史》的撰写工作。此时的我，诚惶诚恐，真不知道给读者是否提供了一幅甘肃近代社会演变的真实画卷，更不知道某些评价分析是否中肯得当。

那个离我们远去的时代承载了太多的历史重负，那是一个新与旧、内与外等各种因素交错碰撞、彼此冲突和交融的时代，是“沉沦”的文明需要变革的时代，是一个开启希望和发展的新时代的前夜。今天社会的变革肇始于近代，是那个时代变革的延续，这种变革浸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当然，学术也不例外。学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近代以来也经历了探索、变革、转型、发展的艰难历程。

进入近代，传统史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史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都面临着变革。史学应该研究什么，怎样研究，如何继承中国丰富的史学文化遗产等问题不断地困扰着学者们，许多学者就这些问题在进行着不懈的思考和探索。可以说，自进入近代以来，传统史学便开始了它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这种探索在今天仍然没有终止。今天，我们仍然在探索史学研究的内容、价值、功能、方法等问题，诸如历史是什么？应该反映什么？能给人带来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基本还是继承了近代史学探究的脉络，应该说近代以来史学在探索中蹒跚前行。社会史就是传统史学进入近代以来探索发展的结果。

在谈社会史时，有必要对传统史学做些简单的梳理和交代。提起传统史学，大凡搞史学研究的人都应该有所了解，传统史学指近代以前数千年的史学，与经、子、集并存，属于中国传统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史学注重政治史的研究，尤其注重政治史里的王朝史。近代以来，史学家们在注重政治史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历史发展的其他领域，社会史便是近代以来史学探索的范例。

自从社会史产生以后，至今已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从小到大，从零星到系统，从浅显到深沉，从断断续续到成为学科体系，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文化大革命”期间，它一度被政治史吞噬，陷入沉寂。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史研究经过沉寂以后复起，便为明显一例，目前已经成为具有明显学科特点的专门史。它试图将中国传统历史从注重事实叙述发展到思想的整理，从零星单纯的考证上升到追根溯源的原因探究，从唯我的诠释发展到客观的分析；它与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风俗史等专门史在研究内容上有交叉，又有区别，有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和框架。它借鉴社会学的方法，以新的视角对历史予以叙述、分析和解剖，阐述系统新颖的学术思想，以启迪世人，探索真理；它从关注普通人的历史入手，关注那些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英名，却是今天文化的传承者的历史；它从在传统正史里很难引起人们注意，却又确实存在的内容入手，来诠释真实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在材料的应用上，既注重从正史里挖掘，也注重从边缘上去筛选，甚至从文学作品、个人传记、信笺随笔等文字作品里去过滤；在视角上，它注重微观上的研究和探索；在叙述方法上，它打破了传统史学严肃冷峻的面孔，采用浅显的富有文学色彩的笔墨对社会进行生动的叙述和解剖；在学科建设上，它力图开创唯物史观的新境界。

社会史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许多学者认识到，近代以来，乡

村社会的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鉴于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区域社会史研究日益繁盛。区域史是社会史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史学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区域史研究的兴起，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区域史研究成果，对于史学研究取向的转换、研究问题的深入和研究格局的改变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因而，区域史研究也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上，有的学者通过回顾乡村社会等问题作了一些思考；有的学者则在总结 20 世纪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求区域史研究的新建构；有的学者则开拓了史学资料的范围，搜集了大量民间文献资料。新史料对于社会史的存在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传统史学里一些看似不具价值的史料在社会史学者的搜集整理下重放光芒。

《甘肃近代社会史》就是本着区域社会研究的展开而撰写的，是社会史研究的子课题。它以微观的视角，去叙述历史，剖析历史，关怀历史，对某一时期的区域社会进行叙述、诠释和研究。它主要探讨甘肃近代社会的存在状况如何，各部分有什么样的关系，在近代化的社会因素出现后，这些传统社会的各种存在状况是如何嬗变的，它的变化轨迹如何等问题。甘肃地域广阔，各地的子社会系统在许多方面又有很大的差异。本书叙述甘肃这一地理范围内的基本社会存在状况，廓清其在特殊时期的演变轨迹，对甘肃近代社会进行全面的叙述、了解和分析。分析各种社会存在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以便从微观上更生动、更理性地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理解社会。全书分为 13 章，分别是：社会人口、社会血缘、社会区域、少数民族社会的某些特征、社会阶层与各种会团、社会物质生活、社会礼俗、日常娱乐、宗教信仰、社会权力体系、社会救济和民间习惯法、社会教育、社会问题。其

中，在人口方面，叙述分析甘肃近代社会的人口数量、人口性别比例、人口分布状况及变化；在家庭方面，叙述家庭的组建、家庭类型、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等的存在状况及演变轨迹；在宗族方面，叙述宗族构成、宗族社会功能等存在状况及演变轨迹；在社会区域上，以村落城镇社区为研究对象，叙述近代村落城镇社区的规模、内部关系等相关内容。其他还有社会礼俗、日常娱乐、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的内容。通过对近代社会精神生活的叙述和研究来了解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在近代的变革。

甘肃近代社会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组成部分，它既有中国近代社会的共性，又有区域社会的特点。近代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特殊的时期，社会处在新旧交叉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就像部分学者认为的具有被动性、不平衡性、缓慢性、复合性四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甘肃表现得尤为突出。

社会史在发展过程中，目前就其研究内容以及范畴等问题仍处在争论和探讨中，我在设计框架时，基本上参照了社会史研究方面比较传统的思路和方法，吸取了近几年来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并结合甘肃地方特色加入了诸如少数民族社会等内容。使研究既能体现时代，又能体现区域；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以微观的视野对甘肃近代社会进行基本的澄清和研究，主要是把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忽略的内容，而又在历史上确实存在，且影响和意义重大的社会内容进行研究和叙述。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社会史摆脱了传统史学过分注重政治的做法，而更多的是侧重于平民的活动和存在状况，对其他诸如政治和经济等内容则是附带捎提。同时它也力图保留和整理区域社会的文化遗产。

选择甘肃近代区域社会课题来做，一方面是想对甘肃近代区域社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以开甘肃地方社会史研究的先河；另一方面是想保留大量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今天，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离我们远去的传统乡村社会的

种种存在状况怎样，见于资料记载的东西很多，但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整体来叙述研究的专门著作则很少。因此，保存大量的本土乡村社会的种种存在运行状况和本来面貌是需要努力做的工作。本著述搜集适合课题立意的资料，对其进行筛选和甄别，将其应用到著作中，使其得以保留。我认为，作为史，首先是将历史事实交代清楚，为学界提供可资参考的资料，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近代社会的一扇窗口。其次才是研究，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深入的剖析，给读者以智慧和启示。

笔者用了传统社会（有些也为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的概念，这是对近代社会以近代社会因素为标准来划分的两个阶段。如果以时间来划分的话，民国以前的社会是传统社会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民国以后的社会是近代社会因素逐渐成长的时期。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近代社会因素也侵入中国，这些因素一点一滴地侵蚀着传统社会的肌体，最终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腐烂变质。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环环相扣的等级社会，而近代社会则显现出以职业为身份的平等社会的雏形。但是两者并不是截然划分的，而是在转换过程中有相互影响和渗透的成分。传统社会在解体过程中已出现了以职业为身份的平等社会的雏形，只是其处于萌芽阶段。民国后，传统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等级制的影响尚存，以职业为身份的平等社会因素已在逐渐成长壮大。近代社会因素逐渐取代传统社会因素而占主导地位是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传统社会因素和近代社会因素交相混合的现状，使民国以后的社会复杂而又不成型。甘肃虽然地处偏远，在近代以来，社会也逐渐从血缘等级社会向职业身份社会转化，较之沿海而言，其转化的速度比较慢。因此甘肃近代社会因素与同期沿海相比发育得并不是很充分。民国后，传统社会因素仍然十分顽固，这使甘肃近代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比沿海更为复杂，社会显得更不成型。

在撰写中，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课题的特色。

1. 反映区域社会的真实状况

甘肃东部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甘肃地方社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甘肃近代社会是传统社会的延续。在本书中，我尽量体现甘肃社会的真实状况，对普遍存在的社会习俗叙述得比较简单，而对体现甘肃特色的内容则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我希望当以后的学者或是读者需要这一方面的资料时，本书描述的社会状况能为研究者或是读者提供帮助和启示。

2. 凸显近代社会的变革

近代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变革，社会的变革像涓涓的溪流一样汨汨而出，每一个现有的社会秩序和规范都受到这一溪流的浸湿。近代社会的变革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表现在社会构成的诸多方面。比如家庭、婚姻、人们的观念等都开始发生变化。本著述尽可能地把握近代社会变革的脉络，充分地体现甘肃近代社会变革的程度，从而给人以启示和智慧。

3. 搜集第一手资料

社会史作为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相关的资料十分分散。不仅要浏览地方史志、官府文书档案等必需查阅的资料，还要翻阅历史上存留的所有文字资料，包括碑刻、谱牒、信函、小说、契约等；田野调查也是必不可少的，近代许多社情要通过访谈健在的老人才能了解到。比如说习惯法的内容就需要到各地选择个别地方搞田野调查。这几年，我对甘肃地方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接触，对甘肃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几乎遍阅了省图书馆西北史地文献资料室收藏的相关图书资料。遗憾的是田野调查工作很有局限性，仅在周围地区进行了一些访谈。

需要说明的是，甘肃近代社会的地理范围在1929年以前，包括今天甘肃全境以及宁夏绝大部分地区和青海东部农业区诸

县，1929年三省分治后，甘肃近代区域社会与今天的区域才基本相同了。本著述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在某些章节里，对1929年以前的区域社会仍然按照三省合治时的事实来叙述，而对以后的历史，则按照以后的地理范围来叙述。

尽管我在尽力而为，许多方面仍然显得力不从心。一是资料分散，使我难以凭自己微薄之力在短时间内搜集更多的资料；二是时间仓促，许多需要到田野的调查难以如愿，使我意犹未尽，某些地方叙述得过于简略，感觉有虎头蛇尾之嫌。只能希望在学术上的更多积累和努力，在以后的学术生涯里进一步完善之；三是经费、人力的原因，很多内容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只能暂时勾勒出这样一幅近代社会的粗线条图，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大方，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四是因能力有限，在编修过程中，以该学科所包含的内容来看，恐怕非一本薄书所能涵盖。

在完成本课题后，真诚地感谢那些与我的生命有缘分的人们，谢谢他们对我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作 者

2006年9月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人口	(1)
一、人口数量	(1)
二、人口分布	(7)
三、人口结构	(8)
四、人口迁徙	(13)
第二章 社会血缘	(17)
一、家庭	(18)
二、宗族	(30)
第三章 社会区域	(36)
一、村落	(36)
二、城镇	(41)
第四章 少数民族社会的某些特征	(50)
一、土司	(50)
二、西道堂	(56)
三、少数民族部落	(62)
第五章 社会阶层与各种会团	(63)
一、农民及其生存状况	(64)
二、官僚、宗教等特权阶层	(66)
三、近代商人	(69)
四、手工业者、产业工人	(86)
五、其他社会阶层	(98)

六、帮会、社团、党派	(104)
第六章 社会物质生活	(115)
一、服饰	(115)
二、饮食	(119)
三、居住	(122)
四、出行	(124)
五、民间生活的相关内容	(126)
第七章 社会礼俗	(134)
一、出生礼、成人礼、寿诞礼	(134)
二、婚礼	(137)
三、葬礼	(144)
四、节俗礼仪	(147)
五、日常礼俗	(156)
六、禁忌	(159)
第八章 日常娱乐	(162)
一、娱乐内容	(162)
二、庙会、山会	(170)
三、新兴娱乐	(171)
第九章 宗教信仰	(174)
一、儒家	(174)
二、佛教	(176)
三、道教	(181)
四、伊斯兰教	(184)
五、民间信仰	(190)
六、西方宗教	(198)
七、其他与生活有关的观念意识	(202)
第十章 社会权力体系	(204)
一、清末地方建制	(204)

二、民国地方建制	(216)
三、基层权力	(223)
四、城镇警政	(226)
第十一章 社会救济和民间习惯法	(228)
一、官方救济	(229)
二、民间救济和疾患	(230)
三、宗教救济	(232)
四、两例民间习惯法	(233)
第十二章 社会教育	(237)
一、传统教育	(238)
二、近代教育	(244)
第十三章 社会问题	(254)
一、毒患	(254)
二、兵患	(260)
三、匪患	(263)
参考文献	(266)

第一章 社会人口

人口是构成区域社会的基础，人口的多寡、性别的均衡、教育的程度等均反映出区域社会的基本存在状况，是研究区域社会史理应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因此，本章将对近代以来，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情况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人口数量

区域社会的人口数量反映出社会的存在规模。近代以来，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经历了起伏不定的变化。人口数量的起伏，使区域社会的存在规模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中国封建社会十分重视对户口的管理，认为“长而出分则户益密，生而辄育则口必增”，添丁增口是太平盛世的一个标志。据《甘肃通志稿·民族五·户口》记载，清嘉庆年间，甘肃有近 200 万户，以当下学术界计算人口的通行标准即一户五口人来计算，那时甘肃约有 1000 万人，这是甘肃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历史时期。进入近代，正值道光年间，甘肃人口数量仍然在 1000 万人左右。道光以后，经过“同治之乱”，甘肃人口数量出现了大的回落，锐减至半。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全省人口约有 88 万户，490 万人左右。而到了宣统元年（1909 年），全省人口约有 96 万户，510 万人左右，呈逐渐回升的趋势。民国元年（1912 年），全省人口约有 98 万户，498 万人左右；民国 11 年（1922 年），全省人口约有 116 万户，640 万人左右；民国 17 年（1928 年），全省约有 120 万户，660 万人左右。以上数据中，关于 1928 年的户口数

据，与《甘肃省乡土志稿》记载的约 628 万人的数字相差不多。因此，根据两份资料的记载可以知道，在 1929 年甘肃分治为三省前，人口约有 650 万人。

1929 年，甘肃析置为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域社会的范围缩小，人口数也相应减少。分省时，原属甘肃的青海河湟谷地三县四厅有 40 余万人，宁夏诸州县有 70 余万人，两地合计有 110 余万人。按当时甘肃有 650 万人的人口来看，三省分治后，甘肃剩 540 余万人。现仍据《甘肃省乡土志稿》记载的省政府在民国 22 年（1933 年）的统计数据可知，当时甘肃有 553 万余人。这两个数据相差不多，还是比较可信的。应该说，三省分治后甘肃有 540 余万人是比较可靠的。到 1944 年，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达到 650 多万。^① 1949 年，据《中国人口·甘肃分册》的记载，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达 900 多万。

从以上关于甘肃近代人口数量的变化来看，甘肃近代社会的规模不太稳定，起伏较大，其中有自然的和社会的等多方面的原因。从甘肃有人口记载的历史来看，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到清雍正二年（1724 年）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甘肃区域社会人口的基本情况是：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甘肃约有人口 31.82 万户，129.23 万人，以后人口基本以这一数字为准上下波动，最多时达到 186.9 万人（1189 年），最少时降至 30 万人左右。在近两千年的岁月里，甘肃人口从来没有超过 200 万人^②。清朝康乾盛世后，人民休养生息，人口得到较快增长，增至 1000 万人，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口的猛增使甘肃区域

^① 朱允明：《甘肃省乡土志稿》（一），第 409 页，《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 30 卷，兰州古籍书店 1990 年影印出版。

^② 《甘肃省情》第一部（内部发行），第 57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年。

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亦使甘肃区域社会开始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人口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因素，决定了社会的其他构成。比如随着人口的增加，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数量势必增多，而国家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最终是落实在丁口和户口上的，因此人口、家庭数量的增加使原有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均受到影响。要想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就需要当政者及时洞悉民情，体察世道变迁，不断调整土地制度，改革赋税制度，使社会的各个环节都互相适应、协调运作。而对传统社会来说，要想时时保证增长的人口和各种制度相适应，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清乾嘉以来甘肃人口增加造成的影响较大的社会问题是穆斯林问题。关于清代中期甘肃穆斯林人口到底有多少，因缺乏可据的资料，难以判断。但以今天甘肃、青海河湟谷地、宁夏的汉族人口 2900 余万人的增减情况与今天穆斯林人口 600 余万人的增减情况回溯推理可以看出，清中期甘肃穆斯林人口在 150 万～200 万。另据《秦陇回务纪略》记载，当时在秦陇地区是“民七回三”，即穆斯林人口占了人口的 30%。就是说当时甘肃约有 1000 万人，在这 1000 万人中，东部地区人口占了近 600 万，按“民七回三”的说法，即东部 600 万人口中，穆斯林人口就有近 180 万人。以上采用的两种方法推算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得出的数字却十分接近，由此可以认为，清中期甘肃穆斯林人口有 150 万～200 万人。

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其社会影响开始扩大，要求获得相应社会地位的愿望也日益迫切，而清朝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遏止了穆斯林社会的正常发展，终于在同治年间，爆发了波及西北诸省的穆斯林反清斗争。应该说，穆斯林反清斗争的此起彼伏与其人口的增加有直接的关系。甘肃穆斯林反清斗争持续了近 10 年，对甘肃区域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人口锐减，田园荒芜。

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甘肃人口从道光时的1000万锐减到490余万人。在河西的永昌，“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人口为220232人，但到光绪四年（1880年）只有42832人，比同治之乱前减少了五分之四多。”^① 战乱使区域社会的人口锐减至半。人口的锐减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因为人口是导致社会变革的基本变量，它的变化势必要影响社会的其他构成。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人口的增加，对穆斯林社会来说，就是一种挑战，这使其对土地的要求和在文化上独立发展的愿望日益强烈。而清朝对日益壮大的穆斯林群众仍然沿袭原来的歧视压制政策，这势必要引起穆斯林社会的不满和反抗。而这种不满和反抗则又对社会造成了强烈的重创。

到光绪年间，随着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人口又开始了恢复性的增加，此时中国传统社会面临的革命性变革已拉开了序幕，区域社会进入了一个艰难变革的历史时期。到民国初期，社会虽然变革不断，秩序失缺，但就人口来看，基本呈现出缓慢增加的趋势。

从民国9年（1920年）开始，甘肃人口又遭遇了几次大的动荡。民国9年（1920年），海原、固原、静宁、会宁、通渭等地发生强烈地震，震级达8.5级，造成24.6万人死亡的惨剧。民国15—21年（1926—1932年），甘肃各地的干旱、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此起彼伏。1927年，甘肃古浪发生震级为8级的强烈地震，死亡4万余人；1932年，甘肃昌马堡发生震级为7.6级的强烈地震，死亡7万余人。以上三次地震都被列入20世纪中国十大地震之内。民国18年（1929年）前后，甘肃各地旱灾、瘟疫连续不断，造成了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剧。再加军

^① 中共张掖地委秘书处编印：《河西志》（上编）第5页，甘肃省图书馆藏，1959年油印本。